



「读书有感」

## 从细节中读懂鲁迅的另一面

□ 钟倩

当一个时代研究鲁迅的人比读鲁迅的人还要多,我们该怎样与鲁迅对话呢?阅读《鲁迅还在》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问题。《鲁迅还在》是阎晶明先生深入阅读鲁迅的心灵史,摒弃学者式的高冷与艰涩,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容易接近的平常视角。

阎先生从日常生活和细节“漏洞”入手解析鲁迅的精神世界,不妨归为两大类,第一是日常生活,比如鲁迅的吸烟史、居住史、疾病史,鲁迅与酒、悼念故人以及他笔下的鸟兽鱼虫;第二是人际交往史,做编辑、写序言、作演讲,与萧伯纳、藤野严九郎的交往等。前一类,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疾病史和悼念故人;后一类收获最大的是鲁迅与两位外国友人的交往。

关于悼文,鲁迅写过很多。在《父亲的病》中,他曾写道:“我现在还能听到那时自己的声音,每听到时,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。”所谓“错处”,指向的是当时无用的呼喊对死者离世时的扰乱,因此他的纪念,如对韦素园、柔石、胡也频、刘半农、刘和珍、杨德群等等,都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,极少情感的渲染,体现出评人论事的客观。比如说刘半农,“我爱十年前的半农,而憎恶他的近几年”。他的理性、坦率、冷峻在笔端流转,他不愿看到青年人流血牺牲,他关心逝者的家人或伴侣,他对亡者的怀念中蕴藉着对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的忧感,这是一种大担当和大悲悯。而他作品中的死亡意象,如祥林嫂、陈士成、魏连受等,同样具有多重内涵,令人深思和遐想。

陈丹青曾说过,“鲁迅的魅力,是对人世的巨大同情。”这种同情,既是对国民根性的鞭挞,也有对救国图强的希冀,指向的是现实性,也是长久的当代性,永不过时。阅读鲁迅,我们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。阎晶明先生善于以小见大,比如挖掘鲁迅与萧伯纳的交往细节。1933年,萧伯纳访问上海,大半天时间的停留,却引发半个世纪的争论。萧伯纳与梅兰芳交流,向他送礼物,记者全程在场。鲁迅也随后赶到,“萧在上海时,我同吃了半餐饭,彼此讲了一句话,并照了一张相”。后来鲁迅写了篇《萧伯纳颂》。在他眼中,萧伯纳的到来如一面大镜子,照出眼前的虚伪。“萧并不在周游世界,而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,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——然而落了第。”显而易见,他把这次访问当做试金石,映射出世态和人性的真实模样。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,早已成为师生情的典范,但藤野严九郎的《谨忆周树人君》,却与鲁迅所述并不统一。鲁迅最感激的事,藤野先生却不记得,完全是两种形象,构成有趣且引人想象的文本对

照。阎晶明先生对同一段经历、同一种情谊进行细致入微的对比和分析后认为,一方面,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国家情感在异国被放大,应正视这种容易产生的单向度情感;另一方面,鲁迅在仙台“弃医从文”的人生抉择,其根本动机是疗救国家的科学精神,不在于采矿冶金还是西医学术。

我们与鲁迅对话,其实也是回归心灵、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。阎晶明先生细微的发现、深刻的洞悉,理性的关联,如掘凿深井,穿越历史隧道,恰到好处地汲到一汪汪甘甜清冽的泉水,滋养我们的生命,这就是精神的活水。这种阅读是心灵的勘探,更是现实的关照,为我们认识鲁迅、与他对话提供了一种思维,一种视角。比如《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》,角度独特而新奇,“按图索骥”他的日记,证明他去过故宫,他对历史文献和碑刻、版画、建筑等有浓厚兴趣,却独独没有留下关于故宫的笔墨,这里面既有他对封建皇权的态度,也有对清朝统治者文字狱的深恶痛绝,还有对宏大叙事的一向不喜欢。阎先生没有跟随研究鲁迅的潮流人云亦云,而是在不易觉察的地方洞开一片新世界和新空间,使读者从不同的侧面或“窄门”进入,触发新的思考和审美。

“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,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、几个瓦碟,但也希望,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。”这是鲁迅先生的自谦,亦是平民性的体现。读过两遍《鲁迅全集》,读过孙郁《鲁迅书影录》、陈丹青《笑谈大先生》、林贤治《人间鲁迅》等,再读这本《鲁迅还在》,更加拓展了我的思维外延,认识到鲁迅的多面性。如果说鲁迅从天津“青皮”身上看到“韧性”,从上海“吃白相饭”者身上看到一种“直落”,从厦门“听差”的“言动”中看到“平等观念”,传递出改造国民性的急切之心,那么,阎晶明先生的深度研究则是一种严谨治学和文学表达,对鲁迅研究者是一种价值引领,对广大读者则是文化启迪和灵魂唤醒。

鲁迅的伟大亦是他的平凡,鲁迅的冷峻亦是他的柔和,鲁迅的孤独亦是他的个性。就像阎晶明先生所说,“他是在人间烟火中艰难生活的人,更是在凡俗世界里发出非凡声音的智者。”这样一来,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鲁迅称作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“人力车夫”。鲁迅是有血有肉,有痛有泪,时而矛盾的常人,他扶持作家出书,他关心逝者后人,他演讲从不煽情,他深夜写战斗檄文,白天给海婴讲述“狗熊如何生活,萝卜如何长大”……他就活在我们中间,鲁迅还在,可是,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否还停留在原地踏步?社会发展中是否还存在他批判的某些弊端?值得深思。

「文化论坛」

## 『撞脸』书畅销的背后

□ 杜浩

前段时间出了件有点奇葩的事,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两本著作的中译本,在图书市场竟然以完全相同的书名出现,都叫《低欲望社会》。这样的“撞脸”,让图书市场跟风蹭热点的风气里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,引发业内强烈热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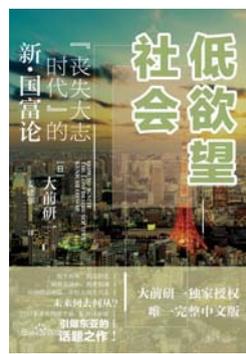
《低欲望社会》是著名日本管理学家、“策略先生”大前研一近期出版的社会观察类畅销著作,书中针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,将其他发展成熟的国家尚未遇到的社会问题概要性地归结为一个词“低欲望社会”——人口减少,超高龄化,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;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,企业也有高额的内外部准备金,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,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,都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,撒钱政策亦无力振兴经济。作者告诫人们思考,身处“低欲望社会”,国民与企业

乱象。目前,在图书出版市场上,只要某一本书走红畅销,随即就会出现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都极相似的“双胞胎”“多胞胎”图书,读者对哪个是原版书,哪个是“山寨”书、“跟风”书,难辨真伪。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就曾被“山寨”;以色列作家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——从动物到上帝》,则被中国一位叫“亚特伍德”的职业写手抄袭了该书书名;《水煮三国》火了,带来了诸如《煮酒品三国》《水淘三国》《烧烤三国》等“花式烹饪”跟风书名;当年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引进国内,大量的“谁动了体”书名随即出现;还有什么“那些事儿”“那些年份”“好妈妈体”“舌尖体”等等。

为什么这些年国内书业“跟风书”“山寨书”“伪书”盛行,有的甚至还成了图书榜上的“常客”,成了畅销书?究其原因,首先是由于出版文化理念的错位。如今的图书出版方、图书策划人、图书经销商基本上是以市场导向为主,商业利润唯一,什么畅销出什么,什么赚钱出什么,赶时尚,抓热点,追浪头,彻底滑向了功利化的、实用的、浮躁的出版,对整个社会的功利化阅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同时,也是流行文化工业类型化生产使然。在流行文化里,作为大众文化的图书出版,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,为了广泛迅速地行销,类型化、模式化和复制化,成了图书的生产、出版和发行的一种文化特征,其策划、包装、促销、宣传和炒作,几乎成了工业流水线一样的生产、营销模式。如今的图书阅读市场,“畅销书”为王,流行至上,一旦某一图书独创“母题”获得成功,某一图书IP创意走红,尤其是一个书名流行了,成了文化品牌,大家就会拼命使用这个书名。而过度消费的结果是,这个书名完全被用烂,变得毫无文化价值可言。由于没有独创力,出版社只能跟风,以“畅销”“流行”为拷贝、复制的目标,有的甚至变成赤裸裸的“抄袭”。没有精心的图书策划,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敬畏,更谈不上文化的原创动力,仅仅是通过低投入,搭上畅销书的车,就能取得高额图书销售利润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种跟风、复制、山寨、抄袭,在业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,甚至变成图书出版界的“潜规则”。

一册图书的存在价值,在于它的思想性、精神性和文化性,但跟风书、山寨书、“攒书”乃至生产“伪书”,则根本是一种文化的虚假和欺骗,它们破坏了我们的出版文化生态,最终也会被读者识破,走向“速朽”之途。



应该如何应对。这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8年9月正式出版,书名为《低欲望社会:“丧失大志时代”的新·国富论》,该版本与日本小学馆出版社日文版原书封面排版、设计风格一致,腰封上注明“大前研一独家授权唯一完整中文版”;而另一家出版社的同名图书,则在大大的书名后,“巧妙”地加了“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”,也“巧妙”地注明译自大前研一在日本出版的另一本书《让我们赶走老后不安》,一切似乎天衣无缝,却显然是张冠李戴,故意“借用”了热门书名。上海译文出版社为此公开发表声明,指责后者涉嫌不正当竞争、引发混淆与误导。

这种图书出版中“搭顺风车”“蹭热点”,书名“撞题”、以假乱真的现象,再次暴露了当下国内图书出版的种种